旧狠傲：农村标语硬伤累 草率上墙为考核

“孩子要一个，票子要多多”、“生活要小康，人口要下降”、“光缆无铜、偷盗判刑”、“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我国农村，随处可见类似内容的标语。当广播、电视在众多农村已经普及的今天，几乎千篇一律、亘古不变的标语还有存在的理由吗？标语的内容和形式是否也该换换“面孔”了？

标语成为一些乡镇财政的负担

在农村常见的标语中，与计划生育相关的占了绝大多数。在甘肃省的乡镇，计划生育标语上墙也成了考核指标，不仅增加了乡镇的财政负担，而且干部群众对这些标语能发挥多大作用也表示怀疑。

酒泉市安西县河东乡党委书记蒋小平介绍说，至少 80%的农村标语是有关计划生育的，但根据乡里近 10 年的统计，农村维持一个低生育水平已有很长时间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经过这么多年的宣传，早已为农民熟知，用标语形式宣传已经没有多少作用了。

但蒋小平无奈地说，目前对乡镇工作的考核中，计划生育实行一票否决，其中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不好，只有好的结果还不行，标语的数量也是考核指标，上级规定一个村民小组至少要有四、五条标语。河东乡只有 4 个行政村、15 个村民小组，去年乡财政收入只有 227 万元，支付工作人员和教师工资后所剩无几，但每年花在标语的上的费用至少要两、三千元。

上秦镇党委书记马海荣说，每个部门都要求刷标语，像计划生育，规定每个村民小组不少于 5 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是一样。今年为了加大劳务输出力度，劳务部门也作出了相应规定。镇上每年都为完成标语任务的事头疼，但这是上级规定的，镇上也没有办法。

张掖市上秦镇计划生育工作站站长方德佳也说，镇上每年花在标语上的费用得 1 万元，乡镇财政本来就紧张，标语更是不小的负担，效果也不怎么明显。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农村家庭都有电视，对各方面的信息都比较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绝大多数超生的是流动性人口，都到城市里面去了。

安西县踏实乡农丰村二组村民王立军有一个 3 岁的儿子，他对记者说，现在不仅城里人不愿生两个，农民也不愿多生；时代在发展，农民的观念也在转变。并且现在学费很贵，孩子多了也养不起。

农村标语还应不应该存在？

随着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现代化媒体工具的普及，即使在甘肃贫困地区，农民获得各种信息、掌握国家政策法规内容的手段与方法也多样化了，因而有人提出质疑，作为一种旧有的宣传手段，农村标语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惠民认为，电视已经成为农村的第一大媒体，广播也比较普及，报纸和网络也正向农村发展，但标语形式还有其独特的优势，仍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还是需要的。

他分析说，标语是广大农村地区老百姓熟悉的一种宣传手段，其最大优势在于保留性很好，并且内容简明扼要，便于人们理解和记忆。现在越来越多的“标语”是商品广告，商家正是看中了标语的这些优势。电视虽然具有信息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等优点，但保留性比较差，许多节目还与农民的切身利益无关，不能完全担负起宣传农村政策的重任；广播也是如此。目前报纸在农村并不普及，网络也只是刚刚起步，所以标语仍有其存在的必要。

但李惠民同时认为，对农村标语一定要进行专门管理，要规范地制定和发布。现在由于管理不规范和制作人员素质较低，各种稀奇古怪的标语比较多，导致宣传功能弱化，变成了一种娱乐化的东西，如常见的“少生孩子多养猪”，便含有对人的尊严的漠视，这就产生了相反的传播效果。

张掖市上秦镇党委书记马海荣说，目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标语太多、太滥，尤其是公路两旁的墙上，几乎已没有任何的空白，而泛滥的结果就是人们都不看标语。有些部门只强调有多少条标语，对制作的好不好并不过多地要求，所以一些地方为了完成任务，就随便刷上算了。他希望上级部门一方面加强对标语的管理，提高标语质量，一方面减少标语数量。这样既能减轻基层负担，又能保证宣传效果。

中國式標語的歷史變遷

国人有写标语的传统，标语离我们的生活如此之近，很多标语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甚至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的符号。我们不妨重新认真审视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标语及其标语现象。

日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清理不合时宜的计生口号、标语，规范计生宣传标语，推荐了一批文明健康、积极向上、充满人文关怀的新用语，眼下，这项工作正在进展中。对此网络上掀起一股热评，有的说，此举是对过去不文明行为的补救；有的认为，此举反映了我们计生工作用语存在的诸多问题；还有的说，此举仍然是一种运动的方式，效果很难持续……

我们不妨重新认真审视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标语及其标语现象。

主导价值观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标语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其实，网络上很多流传的“标语”并不具有鼓动的作用，而是具有震慑和禁止的作用。因此，标语的定义可能要与时俱进，它不仅具有宣传鼓动的作用，还具有威慑和禁止的作用，一方面可用来提倡和宣传某项政策主张或者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可用来反对和禁止某种行为和思想。标语一般是用特大号字体书写、制成横幅悬挂，或者在道路两边、建筑物上直接粉刷大字。标语的内容主要是公益性的，不以赢利为目的，否则就是广告。标语曾经被大量广泛地运用于推动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之中，因此，有人评论说我们是“标语治国”。“标语治国”显然夸大了它的作用，但是标语确实具有营造氛围和气势，起到宣传鼓动的作用，把党和政府的思想、方针、政策或者某一组织的观念、设计公之于众，引起人们的注意，起到广而告之的作用。从现实情况看，标语的拟定、书写和张贴，一般是组织行为，即一定的组织，通常是党委、政府、学校、医院、工矿企业等组织和单位。标语的存在是时代的产物。因为它具有高度浓缩、持久地传达某种信息的功能，因此，在通讯、信息、媒体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中标语就会被大量运用，特别是在进行某种社会运动时更是如此。标语的背后是公共权力，个人很少能够打出标语。标语存在于公共空间，而公共空间的利用是要公共权力允许的。否则，就会像小广告一样被铲除，甚至被判为违法而受到追查和追究。因此，标语一般反映的是公共权力的主导价值观念和政策主张。

开放与进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媒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信息传播的手段和渠道越来越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流动不断加快，人们的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因此，一些传统的宣传和社会动员手段逐渐被现代化的传播形式和手段所取代。现在在城市，人们见到更多的是广告，而不是充满说教味的标语。倒是在农村，特别是在偏远的农村还经常能够见到一些宣传鼓动或威慑禁止性的标语。但是，由于社会和环境的变化，标语的作用和影响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网络上流传的被视为可笑、不文明、不合适的标语，说明人们已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独立判断和批判能力，也说明社会的开放和进步。

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标语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电子标语等新的标语形式不断出现。 现在的标语，特别是大城市里的标语，往往带有强烈的现代气息和人文色彩，反映着时代的主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等具有宽广视野和先进理念的标语口号，在北京的主要街道和公众场所随处可见，表明了我国政府和社会、官员和民众思想观念的开放和进步。

现代化潮流

与我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相一致，标语在城乡之间也存在二元表现，表现为两种不同的风格。与城市“阳春白雪”式的标语不同的是，农村的标语往往充满了乡土气息，更多带有地方特色，体现出很浓的地方话语表达方式的特点，其中不乏生动形象、老百姓易懂、易记的好标语，起到应有的宣传鼓动作用。

农村的标语也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这两年来，新农村建设、八荣八耻、党的先进性教育等方面内容的标语，与宣传人口生育、发家致富、村级民主的标语一起，在农村随处可见，反映着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方面建设的主题、内容和特点。标语的制作者希望通过这些标语，体现党和政府的意志，指导着农民前进的方向，鼓舞着农民前进的步伐。

我们不能简单地拿现在的标准或者现代的观念来剪裁过去的标语。其实，现在看来很土、很俗的标语，往往是群众能够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生动语言，也反映了当时真实的社会状况。

每一条标语自然会带有时代的烙印，它是反映一个时代的官员和群众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执政理念的一面镜子。不过，不要人为放大这面镜子的作用。现存的标语形式会在现代化的潮流中得到改造、更新和替代。其实，历史的发展已经显现和证明了这种趋势。

标语成另类中国符号 铺张宣传且混淆是非

张万树掐指一算，自己干往墙上刷标语的活儿已有 20 年。

在河北省邢台市郊区的一个公路高架桥下，张万树左手提着涂料桶，右手拿着刷子在墙上刷写“严格管理，全心为民”。

张万树还记得第一次刷写的标语是“严禁超生”四个大字，涂在临街王婶家的墙上。他花了一天时间完工，像模像样，张很满意这次的成果，经常跑到王婶家外欣赏这四个字。 之后，村里的大小标语都有张万树的份儿。“没想到自‘严禁超生’后一干就是 20 年。”

刚开始刷标语的时候，村里还有许多人围着看，为此张万树很得意，看得人越多，他干着就越起劲，干得兴起他还哼上两曲。在那个年代，作为上级文件信息的传达者，在墙上写标语是很威风的事。

有一次张万树在墙上刷写“不娶文盲妻，不嫁文盲汉”时，一个路过的小伙子突然问他：“为啥不能娶文盲妻？”张万树说：“娶媳妇还不娶个能干的！”小伙子“哈哈”一乐，反问：“谁说文盲就不能干，想娶谁就娶谁，他管得着嘛！”张万树一愣，有点儿烦，冲小伙子手一挥说：“这是政策，问领导去！别在这儿烦我！”

“那是我第一次碰到有人问这个。”在现在看来，张万树仍然觉得标语写出来自然有它的道理，大家去遵守就可以了。

张万树已经记不清是哪年，单位让刷写的标语再也没有语气强硬、夸张可笑的标语，一位宣传人员告诉他上级领导不让再写“不良标语”。村民坐在门口闲聊时，有时会和刷标语中的张万树开玩笑：“要人命的标语都没了，换成温柔的了。”然后，大伙儿笑成一团。

有段时间，标语如过眼烟花一般，让人眼花缭乱，绽放一瞬，很快旧的标语就被新的所代替。如今，来找张万树写标语的单位越来越少，大的广告牌和板块、还有横幅开始取代墙体标语出现在村中。

“少生优育，利国利民”，一块绿底白字的大广告牌立在邢台市王快村村口。十几年前，刷写在村口的标语却充满了“强制”色彩。

如今，被人称为“硬口号”的标语在邢台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软口号”。邢台市开发区计划生育局长王立敏感慨说：“80 年代初时，还没有计划生育标语。”如今，却四海皆是。但标语却充满了变化，由“命令口吻”进化至“充满人文关怀”。

1980 年 9 月 25 日，一封《公开信》发表，提倡“一个夫妇只生一个好”，同年这句标语就在全国各地被刷上了墙。

随后，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时，由于赶上了建国以来中国第三个生育高峰，计划生育口号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一些标语略显“生硬”。“当时标语中最时髦的词是扎、罚、塌。”任县宣传部部长王仁龙总结道。

1986 年，全民普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全面实施，现代法律文化启蒙教育运动自上而下正式启动。

在那个年代，政策文化的强化在标语上体现的淋漓尽致。相比较而言，社会的法律意识尚在萌芽，尤其是在农村，村民并不认为标语“过激”或者“可笑”，他们认为“很正常”。

90 年代中期，“三五”普法全面开展，党的十五大召开，首次明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完成了从政策文化一元化到政策文化和法治文化并重的转变。

刷在墙上的标语逐渐被清理，或者被新标语代替，一些“硬”标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王立敏手中有一份自上而下传达下来的文件，上面罗列了 254 条人口与计划生育标语，如“为了国家富强，家庭幸福，请您计划生育”、“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儿也是传后人”等，全国各地在刷写标语时再也不是一盘散沙，而是要在 254 条之中选择出最适合当地的标语进行宣传。 这些口号中没有了“扎、罚、塌”等动词，多了“请、好、奖”等字眼。

“随着民主的进程，口号的强制色彩和政治功能正在逐渐减退。比如现在打贪反腐是在用法治的方式，并没有用口号动员全民行动。”《口号与中国》作者之一的李艳说，“从某种角度来讲，将来口号可能还会存在，但是已经不是那种用口号统领和管理社会，实施政令的时代了。这也体现出一种法制的进程”。

标语口号的是是非非

标语口号是什么时候兴起来的，没有考证过。据说最早的标语是战国时代商鞅搞的：“搬木者，定得 50 金，言必有信”，那是为了使百姓相信改革举措。明末继东林党而起的复社，为对付依附宦官魏忠贤的阮大铖，在南京用贴标语造舆论掀起驱阮运动；近代，“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曾使“五四”青年热血沸腾；“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解放战争时期，“要和平，反内战；要民主，反独裁；要自由，反迫害”的口号，动员起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埋葬蒋家王朝。合民意得民心的标语口号确有着无形的巨大力量。

标语作为意识形态载体，总是要被时代打上烙印。

近 50 年来，标语口号却留给人们过多的苦涩记忆。“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弄得民不聊生，路有饿殍。“史无前例”时期标语口号简直是“空前绝后”，比喇叭口号的音量分贝，比标语用词的狠毒，比标语贴得高低，简直是一场标语的战争。其杀伤力也是“空前绝后”。那标语给人的感觉就是恐怖。

恶梦终于过去了。斗来斗去的标语终于不见了。但是变味的标语口号，却依旧疯长。商店在“顾客是上帝”的标语后面干着坑蒙拐骗的勾当；某些机关在“为人民”的标语下，管、卡、压，干着权钱交易的勾当；假、大、空的标语口号风行而时髦。标语成为一种装璜，成为形式主义的帮闲。

标语自然不该一概否定，它可以用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欢乐或批评，也是政府宣传政策的工具。某商场一进门有一条醒目大标语，“生意就在服务中，做生意先学做人”，这种标语至少有一种自我激励作用，好。当然，还有那些“不准”、“严禁”、“违者罚款”之类标语，冷冰冰的面孔和居高临下的训人腔调，就令人生厌了。

说不尽的标语，说不尽的尘世风景。